

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秩序与德育趋向^①

闫旭蕾

摘 要:价值秩序对于人的心灵、社会和谐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形成道德秩序的依据、构成德育内容的中心。价值秩序是社会变迁与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标志，也是道德建构与德育转型的基础。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共同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形成了权利限制的等级社会及其道德秩序；现代社会人由“对人的依赖”转向“对物的依赖”，个体意识觉醒，权利开放，社会强调自律与自治，道德教育着力培育个体的独立与自主能力、学会过公共生活。当下，随着 AI 技术在生活诸领域中普遍应用，经济样态与社会治理方式也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增量经济”在以不同于“存量经济”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社会道德秩序，进而改变德育趋向。为了发挥 AI 的正向作用、消解其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可能威胁，德育需要帮助学生对新异化保持警觉，促使其更新“为人”意识，形成“人-机”和谐共生的道德素养。

关键词:人工智能；价值秩序；道德秩序；德育趋向

作者简介:闫旭蕾，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南京 210079）

价值秩序对于人的心灵、社会和谐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形成道德秩序的依据、构成德育内容的中心。价值秩序是指在多元的、多重的、多样的价值间所确定的秩序，它渗透在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与价值结构之中，并通过共同体的思想秩序、意识秩序和情感秩序体现出来。由于价值追求展现了行为的道德性，价值秩序不仅涉及价值之高低大小的等级，更涉及价值在共同体中的道德秩序。如，我国古代建构了共同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以及“长”“上”利益优先于“幼”“下”利益的价值秩序，并由此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秩序。价值秩序是社会变迁与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标志，也是道德建构与德育转型的基础。随着智能时代及其数字经济的到来，价值秩序与道德秩序必将发生转变，德育亦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或重构思路框架，本文尝试对此予以探讨。

一、价值秩序：德育架构的内在依据

人类在不同历史-社会发展时期，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会形成相应的价值秩序，并依此建构道德秩序，为处理人与自己、他人、共同体、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及其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时代新人培养的社会德育变革研究”（22JJD990031）的研究成果。

提供行为准则与规范。如果说道德旨在处理人们“如何在一起”的问题，道德教育则是帮助人们“学会在一起”，价值秩序也是作为德育建构的内在依据，其内在逻辑关系如下。

（一）生命价值：道德起源与发展的起点

如果说合作、利他是人类道德行为的主要表现，理查德·道金斯、罗伯特·赖特、弗朗斯·德瓦尔则从演化角度揭示了其它动物为了生存与繁衍也具有这两种品质。《自私的基因》一书展示了基因为了实现自身复制具有“自私性”，但一旦关系到种属的生存与繁衍，基因也具有利他性、永恒性，如工蚁和兵蚁为了蚁群的生存不辞辛苦、不畏牺牲。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基因中也蕴含着利他性，就如罗伯特·赖特在《道德的动物——我们为什么如此》一书中指出的：达尔文主义人类学家发现世界各地多种文化全都拥有一套根本相同的进化逻辑，是单一人性对广泛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的产物，利他主义、同情、移情、爱、良知、正义感都有一个坚实的遗传基础；^{[1]7-12}《善恶之源》（Just Babies: The Origins of Good and Evil）通过婴儿的道德感、道德判断展现了人类的道德本能。换言之，人类的“善的本性”与许多其他特性一起，通过常态的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过程从非人祖先那里遗传下来。^{[2]3}人不但身体里含有合作利他的基因，而且由于周遭的各种生存关系更为复杂，人类建构了一系列的规范、规则以处理因资源不足而导致的利益冲突，规避因繁衍竞争引发的危险，进而使社会实践有序运作。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显示：那些更加团结、互助、合作的群体、部落、民族与国家在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中，更容易胜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繁衍与发展。

（二）价值秩序：社会道德的内核

虽然生存演化使人类拥有合作利他的基因，但全然好人好事的“天堂境遇”并非人类社会生活进程的生活常态^{[3]228}。为了促使合作、避免因利益冲突产生的暴力削弱群体自身力量以及在族群生存竞争中胜出，人类在历经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三次技术革命的同时，建构了相应的价值与社会道德秩序。

从演变的角度来看，人猿揖别的节点在于人能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会使用与制作工具以及运用语言，促进了大脑的发育。智人的语言交流不只传递周遭动植物之类的信息，而且也传递、交流关于族群成员的信息。因为，在狩猎过程中与谁合作攸关性命，仅仅知道猎物的信息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部落里人们的特长、关系亲疏与人格品质。对复杂人际关系及其变动的关切使人发展出虚构叙事能力，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随之应运而生。虚构故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发展不再停留于“基因演化”，而开启了一条“凝聚人心”、“以文化人”的快速发展之路。

随着智人狩猎技术的提高、人口密度的加大，农业革命出现了，进而促生了古代文明及其价值与道德秩序的形成。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或宗教为封建统治、等级社会的合法性辩护，倡导共同体利益至上以及个体为之牺牲的美德。^{[4]288-290}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工业革

命、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出现，农耕文化的价值秩序被颠覆，道德秩序随之改变。曾经被贬低的“物质”与“制作”，以机器生产的形式受到重视；曾经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以资产阶级为代表走向历史舞台；曾经被统治者控制的主要商品贸易，以市场经济的形式被重新配置；曾经被宗教压抑的欲望，在市场利益的追求中被激发；曾经被神授的君权被契约政治所代替，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包括贵族等级）都消灭了；^{[5]23}曾经由宗教建构的精神世界被世俗追求所代替，自由、民主、平等与法治成为现代核心价值。与之相应，现代道德不再关注利他之类的美德以及对意义、生命、存在等形而上学的追问，而是为维护自我利益的陌生个体如何在一起过公共生活建构规则秩序。

（三）内化价值秩序：道德教育的主旨

如果说道德着力于“如何在一起”，德育则旨向“学会如何在一起”；如果说价值秩序构成了道德秩序的内在依据，德育则着力促进个体内化价值秩序。在此意义上，形成价值共识对于任何社会、国家而言都是重要的，其关乎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以及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因为价值秩序是整合社会思想观念、形成共同意识的基础。

结合前述三次革命来看德育建构，原始社会尚未进行系统的道德叙事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与生产生活融合在一起；古代农业社会围绕权利限制与追求美德、现代工业社会围绕权利开放、规则伦理及其价值序列建构了德育理路。具体来说，进入农耕社会之后，由于生产技术更新缓慢、政治权力集中、社会下层的权利被限制，道德要求明确而变化缓慢，行为规范与个体社会身份、角色、地位相应相匹配，个体卓越与追求美德一体两面，高尚的道德引领个体通往神圣之境。古代伦理道德教化与社会阶层相一致，其主要考虑的不是行为的对与错，而是如何使个体获得卓越、社会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伦理教化崇尚天理，尊重权威，强调共同体的利益至上，强调社会各阶层各安其分、各负其责。德育方式主要为灌输-内化，不质疑、不怀疑既有伦理道德要求。在遇到道德困惑时，该做的就是去问那些更聪明的人，而不是去寻找为什么还没有人知道的事。^{[6]243}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实践运作以个体主义为逻辑起点，自致角色置换了先赋角色，行为规范有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私人领域以自由为核心，公共领域以平等为核心。与之相应，现代学校德育主要聚焦于培养个体的公共理性、学会过公共生活、维护现代核心价值，以使受教育者的道德素养与现代化生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适应。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秩序及其道德建构

技术革命与社会变迁史告诉我们，技术革命催生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变革，进而催生新价值序列。如，科学技术革命与市场经济催生了“权利的发明”，并基于它建构了现代价值秩序、社会秩序与道德秩序，权利开放相对于权利限制是一种革命。伴随人工智能（后面简称AI）时代的到来，又将形成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秩序。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主要特征

智能化是人工时代的首要特征。如果说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生产分别依赖的是人力、畜力与机械的力量，智能时代的生产则依赖的是对大数据的算力。如，AI被引入种植业后是这样的景象：每一棵植物都安装上传感器，可以根据其生长状态因材施教，既节约了浇水、施肥的成本，又可以监测每棵植物的生长状况，进而实现节约高效。其次是需要导向。当每棵植物的生长状态受到关注时，意味着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效率与成本仍会受到关注，但“基于需要的AI+”才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基于需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满足产品个性化与多样化生产所需要的条件，二是满足客户的个性化与多样化需要，实现前者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这意味着新生产范式将取代旧生产方式：不再着力于技术及其功能，用生产引导需求，而是从用户角度出发追求使用方便与愉悦，以需求引导生产。为回应人类无穷多样性的需求，供应者需要一方面通过万物互联网即时记录和分析用户行为，推测其兴趣，精细追踪其需求，以此向其推送个性化的信息和广告，再根据用户的需求变化调节生产、流通和分配；另一方面，又要善于从纷繁复杂中看到可能有的关联，进而提供新产品、新服务，那些具有发掘、发现与满足用户力的产品提供者更具有竞争力。最后是新普惠性。当内含“需要”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或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时，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免费无限供给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数据，新技术和新经济中已包含了大量边际成本为零与无限供给的案例显示了这一点^{[7]IV}。总括起来看，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运作将由“存量模式”转向“增量模式”，因为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非竞争性”、“可再生性”和“可替代性”。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秩序

自然科学的发展曾动摇了传统的宗教秩序和政治秩序，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反对宗教权威和封建专制提供了方法、路径，伴随科学发展而形成的客观理性、批判精神与追求真理的意志促进了现代世界和现代精神的形成，进而颠覆了传统价值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但意味着又一次技术革命的出现，也意味着价值及其价值秩序的重构。

1. 人性价值重新加载。面对AI所具有的超人类算力、不断自我更新迭代的学习能力，高效、精确而“不知疲倦”的工作能力，以及对人类生活甚至生命的深刻“介入”，人类对自身发展的未知开始出现了焦虑甚至恐惧，人类是否会沦为“无用阶级”甚至被AI所奴役？人类文明是否会沉没于AI时代？人优于AI的方面表现在哪里？在“人-机”关系中如何体现自身价值？

一直以来，人类通过“贬抑自身的动物性或肉身性走向神性”以定位自身。古代先哲在界定人时特别强调人超越于动物的维度（如“人异于禽兽者几希”、“化性起伪”、“人是政治动物”），并以“神造人”（如上帝造人、女娲造人）来证明人类起源的神圣与高贵，希望通过“天道”、“圣书”等神圣法则规约人的贪欲以避免“动物性”对人心灵的侵袭。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为自然立法，成为像上帝一样的“造物主”，人类中心主义出现了。

“人是目的”，人类高于其它非人类，非人类的价值只有通过人对它的依赖而显现。人类标识自我的维度是理性及其对世界的控制与设计，无论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政治契约的达成、道德秩序的建构还是个体自治与自我价值实现，都建基于理性之上。

如果说以往人通过超越动物凸显人性，未来则需要强调人与 AI 的差异来实现人类自我肯定。“肉身性”是人不同于智能技术的首要表现^{[8]384}，这意味着人类意识的呈现方式与智能技术的运算方式是很不同的。虽然 AlphaGo 在智力上击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昭示了 AI 在认知与算力方面超越了人类，未来也许可以模仿、捕捉大脑每个细胞的活动，但其运算模式是模仿人类的神经系统而不是真正的神经系统，经验的个体性、由此形成的意识的主观性、原创性以及社会的建构和运作是不可复制的。在此意义上可以确定，人就是身体的存在，生物性的肉身、社会性的肉身和感性化的肉身是 AI 所不具备的。^[9]是否“具身”成为人与 AI 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真正的生命”以肉身为载体，生命的最高点就是由身体所拥有的类似感知、本能、欲望、情绪、意识、记忆、想象、创造、发明、皱褶、开启等功能的生命力。^[10]身体中流动着的生命欲望、生命力、生命意志具有惊人的强力，不断推动着人进行各种实践活动、创造着人类文明，人的生命价值应是最受重视的价值。

2. 技术的道德化价值凸显。人们通常认为，道德仅仅是人类所从事的行为，赋予技术以德性似乎犯了一个范畴错误，技术被视为沉默的和被动的、缺乏意向性和自由，它们从来都不能是道德行动者，只有人类才能为技术的发展、实施和使用承担责任。如，一把菜刀并不会自动杀人，举起菜刀的是人，人应该为用菜刀杀人负责，菜刀本身没有道德性。但生活常识也告诉我们，菜刀的发明与锋利的刀刃已经对行为具有了引导性、规范性，要让菜刀远离幼儿以免伤害。今天，我们被各种器具和技术所围绕，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技术的世界，这也意味着我们被其所规引。技术人工物既可以承载某种价值倾向，也可以独立地内含价值倾向。人创造与使用技术，同时技术也塑造了人，构筑了人的生活秩序。

文艺批评家君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曾指出，电视改变了城市家庭成员的交流方式。电视诞生前，晚饭后丈夫读报、妻子缝织，偶尔对话，讨论的是时事新闻或家常里短；而电视诞生后，“对话”变成了屏幕中演讲者的“宣讲”，家庭成员成为电视的聆听者，即便偶尔对话，也是围绕电视内容展开的。人类社会许多其它重要领域也受技术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英国通过制作倾向性广告投喂给“摇摆人群”，暗示欧盟是造成生活不顺和社会问

题的根本原因，最终导致英国脱欧公投成功。随着 AI 对人类生活世界越来越深的、越来越全面系统的介入，其可能引发的伦理道德风险越来越受关注。换个角度看，人们对 AI 的担心其实是对 AI 的道德期待：避免技术直接奴役人、伤害人，在设计与使用 AI 时要使其符合人类的根本价值目的；避免因智能技术鸿沟导致社会与国际不平等，消除隐性的技术歧视；维护人性以避免在技术面前沉沦，增强人的自主性、行动力、本真感、整体感。

3. 共享成为价值链建构的基础。强调在 AI 时代重新加载人性与技术的道德化，实则从超越“工具”或“技艺”的维度关注技术的其它面向，尤其是随着技术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结构性、系统性、整体性、自主性对人类社会的塑造及其内含的价值秩序。如果说农耕技术下形成了共同体利益优先的社会等级及其道德秩序，自然科学发展、市场经济与机器大生产催生了以权利为基础的现代价值秩序。那么，共享则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序列核心，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 AI 技术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链，是由多种技术协作构成的共生系统。智能时代的社会运作依靠的是智能技术，那些协助人类进行生产、生活和工作的智能机器由感知、控制、导航、定位、语言理解与生成、推理与决策等技术类别构成。因此，AI 的诞生本身就是多个技术领域共同参与、共同享有这一成果形成的过程。二是 AI 的发展是一个资源链，需要研制者与普通大众合作、共享。如果没有为消费者提供共享平台，如果没有来自人们日常生活海量的数据喂养，AI 将不会智能。三是 AI 时代的经济发展建基于供应商、企业生产线、机械设备、产品以及消费者的互联互通、信息与价值共享链之上。从目前来看，消费者的智能手机是全球经济运作的基础设施，消费者的休闲时间是互联网世界运转的基本条件，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与消费是市场的起动机。在消费者为王、流量为王、口碑为王的 AI 加持下的新经济运作模式中，为经济发展提供核心动力的是数据而不是石油，消费者是价值创造者、价值消费者，这一现象颠覆了供需双方间的关系。^{[11]4} 为了满足个性化需要以及实现零库存与降低产品成本，需要高效灵活的供应链，需要获取精确数据以实现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企业以及消费者之间实现无缝对接，进而需要在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实现个性化需求与规模化生产达到某种平衡。由此可以看出，智能时代一方面可以更有条件实现个性化，另一方面更需要协作、合作与共享，共享是协作与合作的前提。

简言之，建构 AI 时代价值秩序的逻辑起点需要发生根本性转变，人是在与人造物/人工智能而不是与动物或神比较中定位自身，人的具身性、生命的本真性价值凸显，人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内涵也需要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此，在道德的共享的 AI 技术的助力下，人的存在样态将实现升级，其它价值将在此基础上受到评价。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建构

道德作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在 AI 时代主要表现为调整基于 AI 构成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关各种利益关系，并基于此建构道德秩序。

1. 道德受智能技术调节。如果说人通过对身体的加工、制造与使用工具使自身与其他动物分属、使道德显现，农业技术的发明带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并建构了内含社会等级的伦理道德，现代社会的技术体系已通过所内含的行为规范引导人们的生活。那么，道德受技术调节已然存在，只是没有 AI 之类的高新技术那么直接。

目前，AI 与基因剪辑的结合对伦理道德产生的深刻影响令人瞩目。“它颠覆的不只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而是人本身，是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人类文明！”^[12]如果任其放任，将把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送入“史前时期”，将经过千亿年进化、作为一切文明主体的人类还原为新文明的猿猴的灾难性后果。因为，“基因技术对伦理学的最根本、最深远的挑战，在于通过改造人的生物性的自然本性，和以生物性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的自然本性，消解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人’和‘自然家庭’，从而根本上颠覆传统道德和传统伦理赖以存在的基础。”^[13]基因剪辑对伦理道德的冲击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技术之于道德建构不再只是一种外在的而是卷入其中的不可忽视因素。随着 AI 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普遍运用，它将重构人与现实的各种牵连、世界的呈现方式以及人在世界的方式的情况，也将调节着人与世界的各种道德关系。

2. 伦理化的智能技术调节道德主体代替自主道德主体。随着 AI 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运用，尤其是生命 3.0^[14]或人的“赛博格化”^[15]现象出现，自主道德主体将被伦理化的智能技术调节道德主体代替。在近现代伦理思想中，自由意志是道德主体选择善恶的基础，是承担道德责任的前提，是道德律或义务的表达形式^[16]。然而，当智能技术成为人与现实之间诸多实践关系的组织纽带时，当技术积极主动地成为共塑人在其世界中的方式时，道德主体的“自主性”是通过使用智能技术而实现的，这就意味着自主的道德主体被伦理化的智能技术调节道德主体所取代。这里之所以强调“伦理化”，意在强调道德主体虽然受智能技术调节，但并不意味着人的心灵被奴役、人的选择与判断被技术所代替，而是凸显智能技术的社会的和伦理的意义，强调伦理道德之于人的生存状态仍具有优先权，强调道德主体需要关注技术与人性、道德之间形成的交织及其相应的生活词汇表、实践方式的品质、责任的新内容与新形式，以在智能技术调节下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体性。

3. 基于人-机共生建构道德秩序。当道德受技术调节、自主的道德主体被伦理化的智能技术调节的道德主体所替代时，如何建构人-机共生的道德秩序推到了人类面前。前人工智能时代，无论儒家的“三纲五常”、柏拉图的“正义城邦”还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权利至上”，相应的道德要求皆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与准则，调节的是人在不同历史-文化境遇下的各种利益冲突，道德秩序是人类中心的。然而，随着 AI 迭代学习能力与自主性升级，有可能获得远超人类的智能和力量，进而使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面对新的生存挑战，现有的道德秩序显然已不再适用，“不伤害”、“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尊重”

与“公正”等之类的伦理道德准也不足以应对人-机之间可能出现的生存冲突。鉴于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围绕人-机共生建构道德秩序，其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立足人的立场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基于兴利除弊的选择性应用，对 AI 进行必要的道德规范，铲除威胁人类生存的技术和社会基础。如，给 AI 机器输入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让其敬畏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使其理性、友好、富有德性地为人类服务；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消除 AI 导致的新异化，避免出现技术鸿沟，为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确保人类永远有资格、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是通过人与 AI 的双向建构，加快人类自身进化的步伐，培养用智能技术武装的、具有智能社会特征的新人，建构人机协同、人机和谐、共同提升的新型人-机关系与文明，这一思路的主要理念为：重新认识和界定人际关系和人-机关系，摒弃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万物之灵”的优越感和唯我独尊的“主宰意识”，重新商讨相应的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人-机交互协同、共同提升。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德育趋向

为了发挥 AI 的正向作用、消解 AI 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AI 时代的德育需要对新异化保持警觉，帮助个体更新“为人”意识，形成人-机和谐共生的道德素养。

（一）对新异化保持警觉

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其在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德育应帮助受教育者了解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现代技术对人的制约以及 AI 的潜在风险，对可能存在的技术异化保持警觉，进而实现自我拯救与自我解放。

1. 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人类文明史与技术发展史一体两面。从已有文字记载来看，大部分人类历史叙事围绕政治精英展开，少部分涉及思想与文化精英，猎人、农夫、商贩和工匠的重要性通常被视而不见，这种叙事忽视了生产技术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忽视了人类文明的脆弱性与对技术的依赖性。从技术维度来看，中国古代“大一统”文明的形成固然与儒家意识形态有关，但也不可忽视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兴修堤坝、灌溉水渠、大规模弓弩作战及其组织管理的作用。德国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需要发展水利工程，因而需要动员和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去完成，进而形成了集权政府、帝国统治。

^{[17]2} 对此张笑宇有不同观点，他考证了弩的使用如何支撑秦朝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以及对其后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形塑。^{[18]11-30} 尽管魏特夫与张笑宇观点不同，但他们都论述了中国大一统文明的形成奠基于相应技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首次系统揭示了西方一千年来各种社会环境（包括寺院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戏剧、奢华、战争等）与发明家、企业家和

工程师所取得的较为专门的成果之间的相互作用。^[19]简言之，技术与维护生命、提高生存质量、世界秩序、社会运作、人类发展、自我形塑密切相关，技术更迭与文明更迭一体两面。

2. 引导学生反思现代技术对人的异化。现代科学技术无疑促进了个体与社会的发展，但“技术拜物教”的出现以及工具理性在社会诸领域的殖民，消解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的解放叙事与“人是目的”的愿景，人被工具化了、物化了、异化了。对此，雅思贝尔斯、卢卡奇、马尔库塞、海德格尔、韦伯与福柯等思想者进行了剖析。在雅思贝尔斯看来，技术应服务于人的，但在机械化生产过程中，人却服务于机器，成为经济发展及其技术工作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件；卢卡奇认为，这一现象中所内含的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的思维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马尔库塞阐释了被物化了的、工具化的、异化的人如何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丧失了对解放、自由和美的精神追求；韦伯和福柯分别从现代科层管理技术和权力技术对肉体的规训剖析了主体性的消解。如果将现代生产与社会组织管理的各种技术聚合起来，就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座架”，它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处身“座架”中的人虽然利用技术让事物处于“解蔽”状态，但也被“促逼”“摆置”周遭的自然与世界以索取各种东西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处在“座架”之中不能自拔，人类貌似在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不断超越自我，但却迷失在技术的世界里而不自知。思想者从各个维度剖析了现代技术对人的异化，为学生反思现代技术提供了思路。相较于人在前现代社会遭遇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和专制制度的奴役，现代技术以不同于前现代的方式制约人、奴役人。

3. 帮助学生警觉 AI 可能导致的新异化。随着 AI 造福人类、变革社会的同时，也可能以新内涵、新形式加剧人的物化和异化，德育应帮助学生对此保持警觉，并对这些方面给与关注：当 AI 逐渐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以及社会结构、规则、秩序乃至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时，人易于出现“技术沉溺/成瘾”，进而被宰制。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系统及其运作的信息化、智能化，将会有一大批“失业者”成为“无用阶层”“过剩人”“多余人”，还会因 AI 构筑的各种系统的“高”“新”而使普通大众（特别是“数字穷人”“技术穷人”）不能主导、控制其运作过程，而日益沦为“旁观者”甚至是无足轻重的“附庸”“奴隶”，导致人自身的身体机能、工作技能与社交能力退化，人类将第一次面临系统性退化的危险。^[20]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正在以加速度进行，其造成的异化也在以加速度进行。随着 AI 技术的加速发展及其能力和自主性日益增强，可能具备远超人类的智能和力量，导致人越来越依赖智能技术而越来越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陷入紧张、焦虑和不安之中，又或者因有了更多闲暇与丰裕条件而在“娱乐至死”中遗忘自己，丧失对技术的从容驾驭和自信能力，进而丧失主体意识、反思和批判精神，使人类的前途、命运和生命意义处于不确定与危险之中。针对智能技术可能导致的这些异化，要帮助学生对其保持警觉，进而为维护人的生存尊严奠定基础。

（二）更新存在升级及其“为人”意识

AI 带来的异化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最严重的冲击，这样的冲击对德育也构成了严峻挑战。人被视为万物之灵，是道德的理性动物；劳动创造了人，人通过基于劳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体现自身的类本质。然而，这些定义人性、人类本质的观点受到 AI 的挑战。在理性方面，智能机器可以使用语言、进行逻辑思维，并且随着其大数据搜集、处理信息与迭代学习能力的增强，其思维和行为将具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性、精确性和协同性，并能超越人类完成特定的任务。在劳动与制造、使用工具方面，随着智能系统自主地、不知疲倦地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机器人已开始制造机器人，劳动与生产、使用工具也就不再是人的专有属性。而且，当智能机器成为人工作的伙伴、生活的助手、游戏的玩伴甚至婚姻伴侣时，社会关系由“人-机”、“机-机”关系构成，突破了社会关系的“人-人”定义。面对这些新的严峻挑战，德育需要重新定位“作为人”意味着什么。

1. 把握人与 AI 的根本区别以确立人的价值。人与 AI 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的诞生方式不同。人是在生命亿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人脑通过神经元之间的电化学信号传递信息，AI 则是由多种技术协作结合而形成的，是通过计算机程序和算法模仿人脑实现自动决策和执行任务，是“对自然人的思维进行再思维”^[21]。正是由于二者的这一根本区别，AI 虽然在记忆、概率计算与统计等方面占有优势，但人脑因拥有复杂的生物学结构和功能，能够在广泛的情境中适应和学习，使人脑具有感知、创新思维、情感体验性和高级意识等特征，这是目前 AI 所无法完全达到的。也正因为人具有这些特性，使那些需要同情心、创造性、处理人际关系的工作仍专属于人，如杰奥夫·科尔文（Geoff Colvin）在《人类被低估》一书中所宣称的：“过去 300 年在推动经济发展上被认为重要的那些技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最有价值的了。新的高价值技能是我们最深层的本性的一部分，那些将我们定义为人类的能力：感知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在群体中有生产性地工作；建立关系；共同解决问题；以用逻辑无法达到的力量来表达我们自身。”^[22]⁴

2. 关注“意义”之于“为人”的重要性。人脑的中轴是生存与繁衍，智能是演化的副产品而不是演化的目的。AI 虽然可自主行动，但其行动目的、决策与判断仍是基于人的设计，缺乏辨别善恶的伦理道德意识以及追求意义的意识。为了更好地生存与繁衍，人超越于其它动物建构了伦理道德叙事，并从中定位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然而，当一切需求皆由技术满足，当大量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当生活的意义发生于人与机器人之间，当人们拥有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更多的空闲时间与更多选择，意义的问题随之而来。失业意味着失去劳动，会使人失去价值感，使生活失去意义。如若机器人成为了伙伴或伴侣，则意味着人不再需要人，人对于人也就失去了价值，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23]而且，个体一旦拥有了更丰富的物质、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多的选择，如果个体不能将自己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以获得整体性意义与身份认同，无力挖掘自我的深度或抵制价值多元对自我意义感的消解，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意义的脆弱感、庄严感

的消退、日常生活的空虚与平淡”^[24]这些现代性意义问题。人是一种追求意义与价值感的动物，缺少意义会让人感觉迷茫和痛苦，德育如何帮助个体在智能时代获得意义与价值感成为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3. 形成“在存在升级之中实现人的本质”意识。既然 AI 对人产生了全方位冲击，德育也需要帮助学生面对这一挑战，为人的生命意义和本质表现重新定位。人不同于其它动物依赖本能生存，人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换个角度看，AI 作为“人造物”、人的实践对象与结果，其本身就是人的本质体现，如何更好地利用 AI 实现人的最终解放是人的本质在新阶段的体现。人类若能共享 AI 带来的红利，利用 AI 的积极“异化”^[21]，升级人的存在状态^[23]，将有助于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社会的束缚与自我的局限。基因剪辑和 AI 的结合可以改善人的健康状况、体能、延长人的寿命，摆脱遗传疾病对人的奴役。大量 AI 代替人进行工作，可为人提供物质生活保障，使人摆脱劳动的奴役。此外，借用 AI 以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量子计算等中介，不仅扩大物理交互空间的深度、广度、内容和交互频率、效率，也可以开拓非物理或虚拟交互空间，实现个体与宏观世界的联结，以新的视野、尺度对外部世界进行思维建构并形成新的逻辑观念，进而提高对外部世界的辨识和解释能力，使世界中的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根本性和解。而且，人与智能机器一起所建构的物联网及其社会关系的集合力较之以往更强大，也是一种更强的生产力，人借此可把自身本质的各种要素全面展开。因为，人可以在虚拟现实的平台，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定“任意地”支配物质力量，通过行动实现自己的创意与理想，从中获得的“超能力”可迁移到真实世界，并在从现实向非现实、再面向现实的迂回过程中开发潜能、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三）学习人-机共生

由前述可知，AI 作为科技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促成了人的存在升级，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人的异化风险。为了充分发挥前者避免后者，德育需要帮助学生学习人-机共生。

1. 学习挑战“竞速统治”及其算法偏见。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是竞争逻辑，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都是竞争逻辑，政治、经济、科学、艺术与教育等各领域的动力、资源配置及其运作都来自竞争，智能技术的发明也是竞争的结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需要发明与运用新的效率更高的生产与管理技术，激烈的竞争又刺激了技术创新和购买更快的机器，进而催生了不知疲倦、不怕危险、高效率、高精度、自动化的成为关键性“行动元”（actant）^{[25][26]}的 AI 技术。

随着在生产、消费、金融、咨询与择偶等领域越来越多地运用智能技术，社会、国家与世界治理的决策及其运作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智能算法而不是人类的“生物-化学算法”，将进入“竞速统治”（dromocracy）^{[27]69}，即速度的专制，李世石与阿尔法狗的比赛进程昭示了这一点。尽管李世石获胜了对弈的第一盘，但当他回去吃饭洗澡休息后的第二天再坐到棋桌时，

对面的对手已经学习了前人高手对弈棋局的大数据而“脱胎换骨”。李世石每下一步棋，阿尔法只用1秒就可以把六千万的棋局拿来对比，找出破译经验，智能算法胜出。也就是说，“竞速统治”下的社会运作依赖的是大数据采集与智能算法而不是人类脑力。近几年出现的眼花缭乱的“平台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如“红包补贴”“共享经济”等），其本质为“采集经济”（economy of captation）。即，其竞争力不是由成本和价格的差值来计算，数据收集和分析成为判断和评价竞争优势的标准。^{[28]97}不只是经济领域，政治运作也向算法权力转向。把汪洋一样的每个个体琐碎的喜好（偏好）、意见（偏见）、利益、趣味、欲望、理想、愿景转化成大数据并对其进行政治叙事，是政治进行正当性辩护的依据，政治博弈变成了算力博弈，“数据”代替了“真理”。如此，无论经济和政治都容易被平台操纵，由大数据构成的总体化的符号网络（知识、话语、规范）不但可以“控制”人类“个体”的行动，还可以控制其“无意识”。

“竞速统治”的专制性向德育发出了警示，需要对其可能存在的专制与算法偏见保持反思与批判意识，以促使理论、制度、算法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即，人们需要意识到自身作为数据贡献者的优势，进而通过数据创造与使用避免被操控。如在数字经济中，智能手机是经济运作的超级基础设施；消费者是互联网世界的劳动力，通过各种软件创造大数据、启蒙AI；消费者的消费是市场的动力；消费者的储蓄是资本盈利的前提；消费者如果达成共识可以掌握话语权。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在《社会5.0》^{[29]IIV-VI}一书中阐释了诸多如何通过数据收集与应用信息改善社会问题的案例。如，通过建立万物互联的城市交通网络，借此可以更为深入地分析堵车的原因，并通过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进行交通治理仿真模拟，制定相应的对策。在智能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优质、最新且丰富的实际数据，对数据领域的收集与使用决定着社会运作的优劣。建构数据与建构智能社会数据收集与运用一体两面，数据既可以宰制人也可以成为反宰制的手段。因而，建设理想的智能社会需要人人关注数据、学会解读数据，了解使用数据的规则与模式，进而通过数据运用驱动社会发展，消解智能技术对人的异化。

2. 学习基于“共享”价值以构建智能社会道德秩序。如果说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为了在此境遇下人们有更高的生活与生命质量，需要一方面充分利用智能技术服务于人，避免对人异化；另一方面要建构基于“共享”价值的社会道德秩序，解放人，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幸福感。

由于道德是处理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社会道德秩序建构与维护实则在于处理各种利益冲突中的根本利益问题（或社会利益根本差异）并将其行为原则贯彻于各种利益链条制造的过程。智能社会的经济样态较之以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根本利益冲突及其道德秩序也将不同于以往。智能社会在智能技术加持下，生产着力点由注重标准化规模化转向注重个性化；消费点由“物品消费”转向“精神消费”，对“体验”的要求不断提高^{[29]174}；价值秩序由以货

币性价值为主转向货币性价值与非货币性价值（主要表现为友情、爱情、善意、诚实、信任、平安、自信等方面）并重；经济运作由“以竞争为目的的合作为手段”转向“以合作为目的的竞争为手段”，即由“竞争型”转向“共享型”，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分离，人们使用的许多信息、数据、软件、平台本身虽然有产权，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但不参与交换，却是进行交换的基础条件；经济形式由让“人性去迎合生产物质”到“生产物质迎合人性”的形式转变^{[29]213-214}。基于此，智能社会的目标在于不仅要解决物质财富增长、环境恶化、教育公平、老龄化与少子化等方面的问题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基于共享技术、平台与数据等实现充满活力的以人为中心的和谐社会。如此，基于共享以实现“真正人性化”或“人的本质”成为建构智能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智能社会的道德将着力协调个人最优化与社会最优化的统一。德育需要让受教育者认识到，社会与国家的可持续、和谐发展如秉持这一点，既可体现文明发展的趋势，也可体现人类解放的诉求；设计环境与制度如秉持这一观点，通过搭建共享平台与尊重人性、提高人性化程度以更好地激发人的活力，可在人-机共生中实现人的存在升级；处理诸道德关系利益冲突如遵循这一点，将有助于避免底线道德主导下精神世界的庸俗化，避免因文化或价值多元差异导致的相对、虚无或不可达成共识，消解基于身份的协商对话的不合时宜性，引导个体有更为高尚、高贵的精神追求。

3. 学习在关联性中获取意义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将智能技术运用实现为解放人而不是异化的力量，除了着力于建构“真正人性化”的道德秩序外，还要落实到个体的“做事”“为人”之中，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生而为人”不等于“生而为‘人’”，“出生”虽使人因具有“人的自然属性”而被称之为“人”，但能否成为实现人的本质的人是需要反思与努力的。启蒙运动之所以“种下龙种却收获跳蚤”，主要在于现代社会将个体“原子化”，斩断了其与更大世界的关联，精神根基被摧毁，将自我封装在基于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建构的国家、社会与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之中，导致“人对世界的控制”转变成了“世界对人的控制”，其直接结果就是“西方的没落”“去文明化”，具体表现为沮丧和失落感、价值和目标遗失感，夹杂着占据上风的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自我主义倾向，现代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平庸的人”、“灵魂空虚的人”或“非人”。

相对于现代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科技更为发达，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更为完善，资本势力更为强大，生产效率更高，物质也更为丰富，人的需要与欲望更容易被大数据投喂，价值观更为多元、相对，人对人的依赖也会更少，如果个体不能从原子式的自我生存状态中走出，如果仍以工具理性规训自我，人将进一步被异化、甚至有走向疯狂与毁灭的危险。物极必反，这也意味着更新人的精神状态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人是追求意义与精神秩序的动物，从现代人异化的原因反向求解意义感与自由的获得，个体需要从原子式的自我跳出，摆脱工具理

性的宰制与物欲的奴役，重新回到超越性，追求生命的本真并从中发掘出新的东西，赋予生命以更高的意义。

结合智能社会的价值基础及其运行算法逻辑，重新回到超越性并不意味着让已经觉醒的个体以曾经的方式再嵌入“伟大的存在之链”，而是基于共享平台、技术、资源等，通过将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潜力、内在气质和能力与外在世界多层次多维度关联起来，在完善自我、表现自我潜力的同时满足他者的需要，进而通过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自由的全面发展，这样的思路也是智能技术下“增量经济样态”的应有之义。“增量经济”的运作资源是数据，而数据是可复制的，并不因被使用而损耗，反而可使其数量增加、内容扩大。“增量经济”内含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存量经济”中因排他性资源占有而形成的一元论、二元论（其实质也是一元论），而是关联性、网络性的，因为智能算法就是对数据进行关联性挖掘与分析。与其相应，德育需要培养受教育者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促使其认识到人的劳动与工作价值也将通过对“人-事-物”之间关联性的开发及其对人性的迎合显现出来，以实现工具理性下的生产与发展的超越，进而走向自由全面的发展。

综上所述，如果说前现代社会受制于较低的生产技术水平而使个体生存依赖于共同体，形成了权利限制的等级社会及其道德秩序，德育通过促进个体形成美德以维护共同体利益以及等级社会的合法性；现代社会的进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的形成一体两面，伴随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人由“对人的依赖”转向“对物的依赖”，同时大规模经济利润的形成离不开大多数人的生产与消费，所有这些促成了以权利开放、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社会运作机制，个体自我觉醒，社会强调自律与自治，道德教育着力培育个体的独立与自主能力、形成公共理性、学会过公共生活。那么，随着 AI 技术的运用，经济样态与社会治理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增量经济”以不同于“存量经济”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社会道德秩序，进而德育需要改变思路趋向，帮助学生形成人-机共生所需要的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赖特. 道德的动物——我们为什么如此[M]. 陈蓉霞, 曾凡林, 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2][美]弗朗斯·德瓦尔, 等. 灵长目与哲学家——道德是怎么演化出来的[M]. 赵芊里,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3.

[3]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修订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美]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M]. 谢延光,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 [5][美]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6][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7]王一江. 无限供给: 新经济时代的理论创新[M]//周春生, 扈秀海. 无限供给: 数字时代的新经济.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 [8][美]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9]刘亚斌. 肉身的机器化与机器的肉身化——人工智能美学的身体之维[J]. 美与时代(下), 2019(11).
- [10]韩桂玲. 论后现代身体观的价值尺度[J]. 前沿, 2010(4).
- [11]陈炳祥. 人工智能改变世界: 工业 4.0 时代的商业新引擎[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 [12]樊浩. 高技术的伦理中道[J]. 道德与文明, 2004(4).
- [13]樊浩. 基因技术的“自然”伦理意义——兼答徐宗良教授[J]. 学术月刊, 2007(3).
- [14][美]迈克斯·泰格马克. 生命 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M]. 王婕舒,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
- [15]黄鸣奋. 新媒体时代电子人与赛博主体性的建构[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 [16]邓晓芒. 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 [17][德]卡尔·A. 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M]. 徐式古,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18]张笑宇. 技术与文明: 我们的时代和未来[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 [19][美]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20]孙伟平. 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2).
- [21]余乃忠. 积极的“异化”: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5).
- [22]Geoff Colvin. Humans are underrated: what high achievers know that brilliant machines never will[M]. New York: Penguin, 2015.
- [23]赵汀阳. 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与“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J]. 哲学动态, 2018(4).
- [24]张瑞臣. 意义的空虚感——查尔斯·泰勒论“现代性隐忧”及其效应[J]. 伦理学研究, 2020(1).

[25]吴冠军.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J]. 当代世界与社会
主义, 2019(6).

[26]吴冠军. 后人类状况与中国教育实践[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1).

[27]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s: an essay on dromology[M].New York:
Semiotext, 2006.

[28]Nick Srnicek.Platform capitalism[M].Cambridge:Polity, 2016.

[29]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 社会 5. 0: 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M]. 沈丁心, 译. 北京: 机械
工业出版社, 2020.

Value Order and Moral Education Trend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AN Xulei

Abstract: Value ord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eople's mind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It is the basis for forming moral order and the center of moral education. Value order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social change and good operation of society, and is also the basis of moral construc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f in pre-modern society, community interest is higher than individual interest, forming a hierarchical society with rights restriction and its moral order; In modern society, people shift from "dependence on people" to "dependence on things",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is awakened, rights are open, society emphasizes self-discipline and autonomy, moral education focuses on cultivating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and learning to live public life. At presen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various fields of life, economic patterns and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s are undergoing fundamental changes, and "incremental economy" changes people's ideological values and social moral order in a way different from "stock economy", thus changing the trend of mor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AI and eliminate its threat to human existence, moral education needs to help students stay alert to the new alienation, promote them to renew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form the moral quality of "human-machin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alue order; moral order; moral tendency

Authors: Yan Xulei , a researcher and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 Jing 210097)

转引自《教育研究与实验》2024年第3期